

留学史丛书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修订译本)

〔日〕实藤惠秀 著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留学史丛书

叶隼 主编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修订译本)

〔日〕实藤惠秀 著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一修订译本.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留学史丛书)

ISBN 978-7-301-20057-5

I. ①中… II. ①实… ②谭… ③林… III.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中
国-近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6960 号

© 香港中文大学 1982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书 名: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

著作责任者:[日]实藤惠秀 著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责任编辑:艾 英

封面设计:河上图文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057-5/G·330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8.25 印张 47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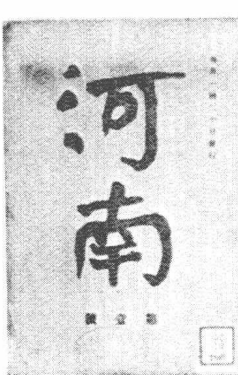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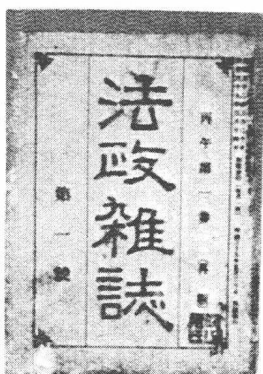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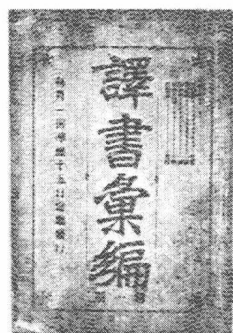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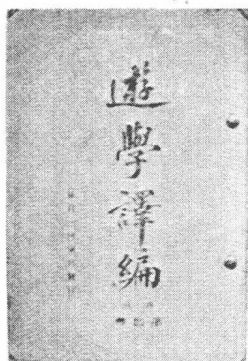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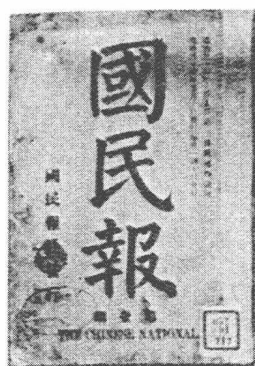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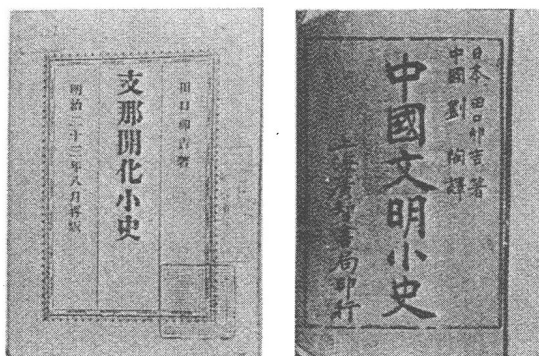
前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发行的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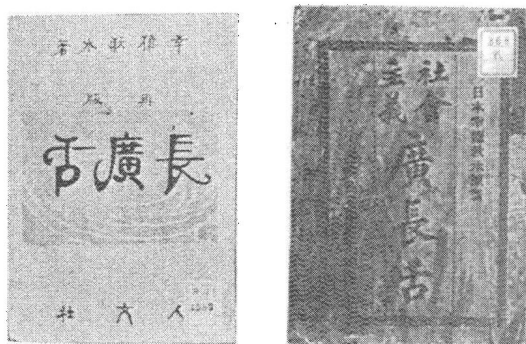
后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发行的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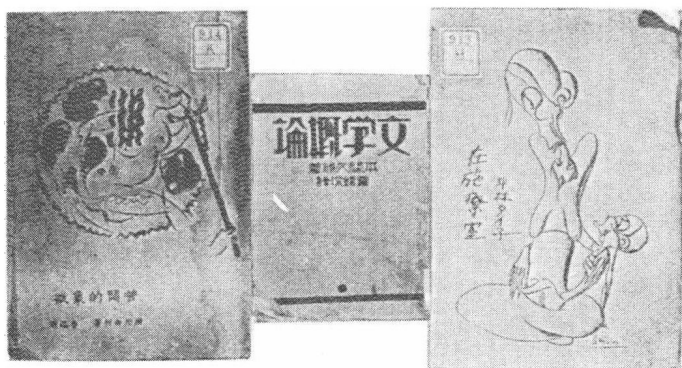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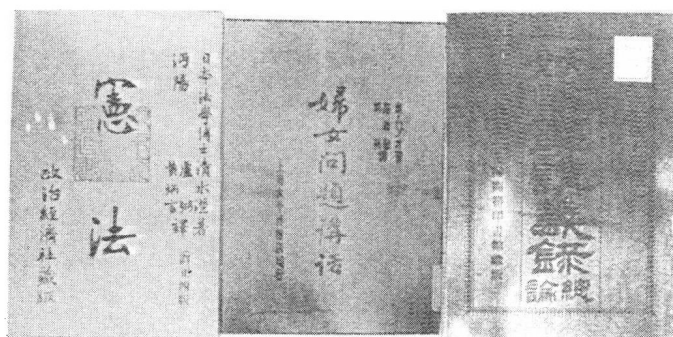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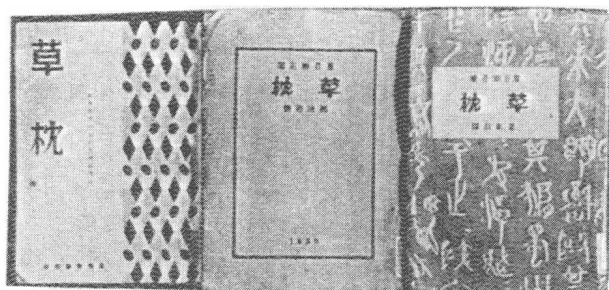
原本（左）譯本二種（右）《佳人之奇遇》



原本（左）譯本（右）《支那開化小史》



日本書及其中譯本(1)



日本书及其中译本(2)

《留学史丛书》总序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感意识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化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世纪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①。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1910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②此处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③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轫,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这是谁的过失?”^④这样一种比较视野的纳入,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中、日近代留学史的成绩或许还有待“百年之后论高下”。毕竟,一时之权

①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第3页,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胡适:《非留学篇》,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1914年1月。

③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18页,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再版。

④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19—20页。

力得否,不能作为终极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①,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留德群体,最后将日本带向了何方呢?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诚哉斯言!可具体言之,对外来资源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批判接受”,这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并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作为古国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其兼收并蓄、博大能容。诚如蒋梦麟所言,“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②。可这样一种吸收能力是如何表现的?它究竟有无特定的规律可循?对当下的中国发展进程来说又有怎样的资鉴意义?若要探讨这样一些本质问题,留学史无疑提供了最佳对象。

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可谓勃然而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显然更上台阶,不仅论文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较有分量和深度的著作。对此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不仅基本的史实得到梳理,而且也开辟出很多具体而深入的论题;但此种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

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实藤惠秀写出了那部被费正清誉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兼“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③,而且德、法、美等国学人在相关领域也各有贡献,诸如韩尼胥的《1860—1945年中国留

① 有论者进一步认为:“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个巨大的失误。”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北京,第76—77页。

②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载明立志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3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③ 见本书《译序》,第2页。

德学生的历史和影响》、Stacey Bieler 的《“爱国者”或“叛徒”——中国留美学生史》^①、森时彦的《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等^②，当然其中也不乏华裔学者或留学生的身影，如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③、王枫初的《移民与政治：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 1919—1925》^④、Ye Weili 的《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⑤、孟虹的《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1861—2001）》等都是^⑥。作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群体的研究，在日、法、德、美等不同的学术语境里，虽然都关注的是中国人留学史，却显然更注重留学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是很可与国内学者的视角成“相辅相成”关系的。

既然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史反思视域中，推出一套“留学史丛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引进世界学术范围内的他山之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推陈出新”，为汉语学界进一步推动留学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具体言之，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尝试，能够兼顾以下几个视角：

一是中国与世界。我们不仅要探索以自身为主体的历史，同样也要关注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助推器的世界留学史研究。当中国正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崛起于世界，世界也在以一种超常的眼光期待中国之时，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气魄”。譬如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即使“身不关己”，也应当予以关注，如以上提及的美国人的德国留学史，就颇值得探究；同样，日本在近现代崛起过程中求知于世界的留学史，也足为中国人留学史之最佳参照。即便是在我们已有相当

① Bieler, Stacey: “Patriots” or “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4.

② [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史会来等译，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③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1872-1949*.

④ Wang, Nora: *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⑤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Meng Ho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 Wien: Peter Lang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5.

积累的中国留学史领域,也要特别强调一层“重思”的意义,至少应当注意到涉猎国别的全面性,即由欧洲主要国家如德、法、英拓展到美、日、俄等世界性大国;并进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埃及的中国人留学史。此中特别强调的是留学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结合,特别注重国别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意义。

二是宏观与个案。在强调国别史研究的同时,在现阶段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性研究,也就是说要将留学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相当数量的个案之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与大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融通维度。这既包括对重要留学人的专门研究,如以陈寅恪为个案,考察其留学多国的阅历;也意味着推出新的研究范式,将留学人留学不同国别、不同大学而获得的不同思想资源转化于现代中国文化场域实践过程之中,如以吴宓、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研究,就应更看重其分别师从白璧德与杜威的背景,而归国后又分别为“学衡派”、“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史位置,将美国自身思想路径的分化(背后涉及欧洲文化内部异途的世界性思想潮流变更)与中国的思想分化充分结合,将现代中国更具体地落实到世界场域之中去。

三是现代与传统。我们在考察以现代为主体的留学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复归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思想资源的主动汲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沉入历史”。譬如对于中国而言,更长距离的留学史迹需要仔细爬梳,如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留印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而日本留学僧、留学生的来华历程,同样也值得细加清理。而注意到现代的维度,则涉猎范围既以文化史、思想史为关注中心,同时又更加关注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动功能,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文化史研究通过思想史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留学史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提供一种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主要文明成长过程的新的观察角度,或许,可以由此更好地揭示出发现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可能。至少可以承认的一点是,舒新城当年所指出的事实至今并无根本改变,即:“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

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①留学史研究的意义显然并非“无足轻重”。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不曾辜负了留学史上那些星光闪耀的前贤巨子!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年。

译序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势日蹙,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非大力培植人才,积极学取西洋近代文化,无以求存图强。故自1872年起,中国即派学生留学西洋。惜当时社会风气闭塞保守,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以致留学一事不为社会所重,其成效亦甚微。惟自经洋务运动的无功与甲午战役的惨败,国人始猛然觉悟,日本维新之有成,端在善于学取西洋文化所致。故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强之要径。盖国人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竭力输入西洋文化,每能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因而相信若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可获事半功倍之效;且东游又有路近、费省、文同各种便利。职是之故,自清末以还,虽国内变乱频繁,中日邦交屡有起伏,而负笈东渡者,始终络绎不绝。计自1896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5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巨的影响。

然而,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富有历史意义而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尚乏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有关留日史的专门研究,亦甚少见。就调查所得,目前可见的专著似仅有以下几种: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1933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北,1976年)、颖之《中国近代留学简史》(上海,1979年)等。除黄氏之书比较清楚说明清末留日运动历史的发展外,其余诸书,所涉年代虽较长,范围亦算广,但都不免失于疏略,读者即使比合而观,亦难得见留日运动史全貌。

实藤惠秀教授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初版,1970年增订版)一书,出版年代虽比后三书为早,但至今仍为资料最丰富,论述范围最广,而所涉年代最完整的一部学术著作。国际学界对此书的评价,一向甚

高。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但可弥补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还可启导国人开拓更广阔而深入的研究。

实藤先生《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使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等,详述1896年至1937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种类及课程,亦论及清末以来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又另立专章详细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亦颇平实客观,故面世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叶中日文化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且被认为对开拓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具启发作用。美国前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费正清博士曾称本书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盛赞实藤先生的研究乃“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洵为的论。

实藤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自1928年起即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及其附属的学院,以迄1965年荣休。早稻田大学自清末以来即招收大量中国留日学生,设立“清国留学生部”,故与中国的留日史关系至为密切。实藤先生对中国留学生问题发生兴趣,与他长期所受教育和工作的环境很有关系。自20年代起,先生即着手搜集清末以降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史料,并且立下宏愿,要撰写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书。经十多年辛勤的工作,获得数千种与留日学生有关的图书和资料(抗日战争后期,先生把该批贵重文献赠予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近年改名为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度藏,使免遭战火,至60年代经馆方整理后,专设“实藤文库”,供学者研究之用,迄今仍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问题的宝库之一),先生即以这批资料为基础,于1939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由东京日华学会出版(非卖品)。战后,实藤先生重新改写《史稿》,经多次的增订改易,于1960年以《中国留日学生史之研究》一文,荣获日本国家颁授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1970年再出增订版。由此可见先生对此书写作之严谨和慎重。

增订版的《留日史》,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缩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留日学生史的研究,的确可视实藤先生毕生致力的学术事业。读者不难由本书的撰述经历,体会作者

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

此外,实藤先生又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学的专家,其重要著作有:《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联系》(1943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1955年)、《为了日本语的纯正》(1956年)、《中国的文字改革》(1958年)、《近代中日交涉史话》(1973年)等;编译作品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与丰田穰合译,1942年)、老舍《四世同堂》(与铃木择郎等合译,1951—1952年)、王瑶《现代中国文学讲义》(与千田九一等合译,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语文法讲话》(与北浦藤郎合译,1956年)、《大河内文书——明治中日文化人的交游》(1964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郑子瑜合编,1968年)、《中日非友好的历史》(197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涉史话》(1973年)、《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0年)、《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1年),合共数十种之多。

《留日史》中译本据1970年的增订版译出。两位译者与著者虽然年差半百,但自1968年起即结忘年之交,且曾多次合作,研究《留日史》的翻译工作,因此经常获得原著者的鼓励和帮助。中译本直接引用的罕见中文文献,即多由原著者提供。在译文方面,译者经常通过书信向著者请益问难,必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详尽答复。此外,原著者又同意译者订正原著若干漏误,删节过长的引文,更动原著若干章节和段落,务使中译本在外观上与内容上均可达致更佳的平衡。至于遣词用字方面,著者更鼓励译者可作藻饰。著者以上种种虚怀若谷的做法,使译者深为感动。译者复参考新近出版资料,重编留日史大事年表,补加译注和征引文献目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方便。

本书的翻译,由开始动笔至定稿完成,荏苒已过十三载岁月。在这段悠长的日子中,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时辍时续,使本书未能早日与读者见面,我们惟有向原著者和读者表示最深的歉意。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逊(Marius B. Jansen)教授先后大力荐介原著,使我们加深对原著的认识,从而促发翻译的动机和坚持翻译的决心。在翻译过程中,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陈荆和教授、孙国栋教授、王尔敏先生、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黎明先生等师长经常不吝赐教,良深感纫。复承汪向荣先生、萧滋先生、余冠初先生、梁国豪先生、陈湛颐先生、周佳荣先生、李朝津先生、何炳坚先生、何镇中先生等,或润饰译文,或提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我们还要特别

感谢我们的妻子谭丽萍女士和林洁明女士,分别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分担了不少劳苦。

对于原著者实藤惠秀先生,我们不但衷心感谢他十多年来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指教和帮助,更要感谢他半个世纪以来献身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努力和成就。

译者识力有限,本书谬误之处,与上述诸位师友无关,概由译者负责。冀盼同道先进,不吝批评指正。

谭汝谦

林启彦

1981年3月5日于香港

“北大版”说明

首先,我们三十年前的旧译,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重视,给予再版,我们十分感激。我们要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的编辑艾英女士。近两年来,艾英女士悉心协助和督促我们的修订工作,称得上鞠躬尽瘁,无微不至。

说实话,“北大版”是应海内外广大读者要求而诞生的。旧译面世以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繁体版;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简体版),引发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生和研究者对留日运动的关注。据说“中大版”和“三联版”早就售罄。近三十年来,我们虽然在香港或美国工作、定居,仍经常收到各地读者邮件,要求提供译本中提及的史料或协助购买我们的译本。“北大版”面世,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北大版”修订了“中大版”和“三联版”的错漏,也改正了一些误译和手民之误。林启彦博士又新译原作者情文并茂的“后记——我和中国”(“三联版”的“后记”由曾丽卿译、汪向荣校),使这一译本可以保留原书的全貌。

最后,本书涉猎一百多年的中日文化关系,其错综复杂无以复加。原作者实藤惠秀先生(1896—1985)学识深湛,持论平实,但是亦难以完全超脱时代环境的限制。译者更是识力有限,本书错误不足的地方,尚祈各方笃学之士批评指正。

谭汝谦于美国明州

林启彦于中国香港

2012年2月12日